

日美會談與兩國關係

張棟材

一 前 言

近年來日美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及合作範圍，從雙方高階層決策人士的接觸頻繁一事即可看出益形增強與擴大。但不容否認地，兩國之間也仍存在着舊有的若干矛盾歧見，甚至還蒙上了相互猜疑的陰影。關於這一點，日本外務省官員曾很坦率地分析其中實情稱：「日美兩國對安保體制各抱有三個不安的懸念，其在日本方面者為：（一）美國在發生核子戰爭時，是否會真正地保衛日本？（二）美國的圍堵政策，其結果是否勢將迫使日本捲入戰爭？（三）假定日本一旦擺脫與美同盟之羈絆，美國對日將出於何種對策？其在美國方面者則為：（一）日本對國防究將作何打算？其態度令人費解。（二）在不久的將來，日本政局是否將起變化而向中立與解除日美安保條約發展？（三）在琉球推行之反美基地與要求歸還行政權運動是否將更助長日本之反美情緒？」（見六月廿六日「每日新聞」）這項分析確能道破日美關係的癥結所在，由此亦可見雙方應有的「誠」「信」基礎，尚未臻於鞏固。

日美兩國從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會在日本東京、京都先後舉行了第四次「日美協議」；第五次「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會議，以及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與日外相佐藤榮作的個別會談。觀其會談內容，可以說都是能左右雙方當前與未來合作關係的重大問題，也更可間接影響到今後亞洲情勢演變的趨向。

在此之前，美國政要及報刊都曾發表了對日評價頗高的言論，在時間上就好像是有意的事先安排似地，與美對日政策極為配合，以含有安撫、激發作用的獎譽，表達出了美國所殷切期望於日本的願望乃是要日本積極地協助美國分擔任務。如：美副總統韓福瑞於六月八日在西點軍校講詞中會稱：「在亞洲弧狀地域的一端，我國擁有高度發達的強國日本為友邦，它是我的第二位貿易對象國家，而且是能在亞洲經濟開發上發揮巨大潛在力的國家」

。美農業部長富里曼於六月二十三日之日美農產物貿易會議中亦稱：「日本必將對美援助低度開發國家一舉，盡其竭力協助之道。」他如紐約時報則對日本召開東南亞經濟開發會議及參加漢城九國部長級會議等外交動向深表讚許，認為可使「美國不必親自出席」；華盛頓郵報更輯有「日本特刊」（六月十九日）廣泛介紹日本各方面之卓越成就，這些對日本評價的用意，很明顯地都出於上述之同一動機。不過，也有的報紙調論透露了足以代表美國朝野一部份人士尚難以出口的內心憂慮，如洛山磯時報所稱：「日本在認清了它所負的新任務後，行將冷淡對美關係，逐漸染上戴高樂式的色彩」。

二 箱根之第四次日美協議

「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的定期性「年一度的會議，是日美之間以對等地位協商問題的一次重要接觸。名義上雖說是貿易經濟會議，但議題却不僅限於貿易範圍，它牽涉到的國際政治外交問題是一年比一年地增多，而使這個會議在事實上已變成政治性的會議。日本報紙對此會引述美國駐日記者的看法加以解說稱：「如果這個會議從正面檢討政治、軍事問題，那將會招來極大的反作用。這個會議的機構用貿易經濟做外表的招牌，而實際上却能達成兩國政治關係更加密切與國民的相互友好，這便是雙方運用外交上的成功之處。」（見六月廿三日「朝日新聞」）

在此一會議召開之前，由日外務省高級官員與美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合辦的另一定期會議「第四次日美協議」，亦於六月十八日起在日本東京附近之箱根舉行。日方出席者為牛場外務審議官及北美、亞洲、歐亞經濟合作等局局長；美方出席者為美駐日大使雷紹華及新任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委員長之奧恩。一般地講，都認為這一個會議等於是為第五次日美貿易會議作事前協商的預備會議，因而在國際間也就特別注視第五次日美貿易會議的動向。同時，更由於日外務省對新聞記者聲明不公佈討議內容，則愈加

引起外界的各種推測。

第四次「日美協議」因係在箱根舉行，故日、美報紙多簡稱其為「箱根會談」。我們根據日美雙方出席者所片斷公開出的言論來看，很有理由相信這一個會談是以所謂「中國問題」為中心議題，其他如①世界情勢；②越戰展望；③防止核子擴散與裁軍；④日美安保體制；⑤經濟合作等問題，毋寧說都是附帶論及的。

日美心目中的所謂「中國問題」，主要是包括①「兩個中國」論；②共匪現狀分析；③聯合國「中國代表權」；④對共匪妥協政策之可能性；⑤共匪第二代和平轉變論；⑥日本對匪貿易「政經分離」論……等項目，日美兩國各抱有對匪情研究的自負心，日本所恃者為：具有歷史與地理上的先天有利條件，且能輔以人的實地觀察作證；美國則認其以大量人力物力蒐集圖書資料與情報供專家學者研究，為其獨有之特色。因之，這樣一次的日美箱根會談，堪稱為雙方對匪情研究的一次競賽，雙方都在這個問題上向對方作了最短距離的探測，各向即將舉行的第五次日美貿經會議提出參考報告。

三 京都之第五次日美貿經會議

第五次「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會議於七月五日至七日在日本京都舉行。日方的出席委員為：外相椎名悅三郎、財相福田赳夫、農相坂田英一、通產相三木武夫、勞相小平久雄、運輸相中村寅太、經濟企劃廳長官藤山愛一郎，另有駐美大使武內龍次列席；美方的出席委員為：國務卿魯斯克、內政部長尤道爾、農業部長富里曼、商務部長柯納、勞動部長威爾滋、財政次長巴爾、總統經濟顧問奧肯，另有駐日大使雷紹華列席。

此次會議所予人之強烈印象，為下列諸點：

一、貿經會議在實質上確已完全蛻變為政治會議，自開幕之日由魯斯克、椎名兩人代表美、日政府的致詞起，以迄閉會的共同聲明，都已將會議的政治性格公開宣露，不再有所避諱，即日本輿論亦多對此點表示為必然之歸趨。

二、會外個別會談的比重超過會內的集體討議，因美日間重大的貿經案多已解決，大會的有關貿經議案只是事務性而非政策性的範圍，其最為雙方關心而起爭執的政治問題，則全屬於魯斯克與椎名的個別會談。

三、魯斯克控制會內外會談的主導力極為突出，其堅定一貫的主張說辭，壓制了日方的各種反調，終能佔居上風。他表現出了從容不迫與溫文內涵威勢的態度，形成始終由他一人控制進行方向的感覺。

四、日本內部的複雜情況有不容忽視的嚴重性，大會會場及美方人員宿舍的安全保障，都是依靠在日方勤員的數千名警察身上。在會議期間，日本左翼青年學生勞工社團的羣衆反美示威遊行，曾與警察發生衝突，此種事件在日本幾已司空見慣，它反映出日本內部對立的複雜性，也顯示出日美合作前途的多難。

綜觀日美雙方在此次會議通過大會，自由討論與魯斯克、椎名個別會談所激辯的政治問題，正如日本報紙所稱：「三天會談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對待中共』這件事情」（朝日新聞七月八日）「最大的焦點是『中共問題』（每日新聞七月七日）此一情形，本來在六月間日美的箱根會談中便已有了一徵兆，惟雙方對共匪的觀點與政策的分歧程度，過去並沒有如此露骨地正式宣佈過，這次却把它攤開了，就日美關係論，究將如何協調自然是一項考驗。

在以往之四次會議中（第一次：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二次：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第三次：一九六三年秋因甘迺迪總統被刺，臨時停開，延至一九六四年一月。第四次：一九六五年七月），日美之間最不協調的是第三次會議，那也是起因於對共匪問題。該年初適遇法國承認共匪，日本對美所提起應注意來自共匪之威脅的忠告置若罔聞，且駁稱：「日本在過去及現在從未感到身受共匪之直接具體的威脅」，開始表露出它有意投機的動搖姿態。這次日本隨其發言權之增高，在對共匪問題上實有毫無忌憚地暢所欲言之概。

如果將日美雙方的不同意見作一對照，其要點為下列：

（日方意見）一、共匪並非一如美所想像中之戰爭狂人，其對外強硬政策亦並非絕難改變。日本願伸出溫和之手與其發生接觸，冀其由自陷於孤立困境中脫身。

二、日本政府基於「政經分離」原則，竭力謀取與共匪擴大貿易，深信此舉可達成誘導其與西方國家和平共存之實際功能。

三、日匪貿易於去年已增至四億七千萬美元，為求更加發揮具有對匪接觸媒介作用之貿易計，日本政府應循西歐諸國對匪貿易先例，得用長期信用

付款方式從事對匪輸出。

(美方意見)一、共匪雖已在國際上愈陷於不利形勢，但仍不顧一切地採取好戰政策，且不僅敵視美國，亦敵視全自由世界，北平政權實為製造亞洲及世界不安之根源。

二、共匪決不期望和平出現，對此一好戰政權必須堅定嚴正制裁之立場，故凡藉貿易而有助其充實力量者，即至爲不當。

三、日本政府既以「政經分離」為對華貿易原則，自不應採用屬於政治性的近似援助之長期信用付款方式。美國向來反對以此一方式與共產國家從事貿易。

雙方的不同意見，在魯斯克與柏名的兩次個別會談中迄未剖露，但較接近的折衷案，因而在共同聲明中就只有將其分別並列，原文爲：「委員會會就發展東西貿易關係及兩國政府對此一問題之政策交換意見。日本代表團於論及日本與共產國家間增大貿易而取得之經濟環境外，並表明日本政府基於政經分離原則與該等國家發展通商關係之意向。美國代表團則說明美國與中共、北韓及北越並無經濟關係之理由；以及由美洲機構對古巴實行經濟封鎖之理由。同時於表明反對以長期信貸方式與共產國家貿易之外，亦說明美國對發展與蘇聯及東歐諸國之非戰略物資貿易；以及與該等國家互通往來與接觸之途徑，正在重加檢討。」

這一段文字雖是雙方不同意見的並列，但美方所表明的「反對」字樣，却是最顯著而引人注目的。故在四百餘名日、外新聞記者的招待會中，記者們多對此提出質詢，魯斯克則作了極得體的答覆：「日美之間有非常廣泛的共同利益，雙方對細節問題之歧見，係由於兩國所處地理環境不同而起，但在共同利益下，不致蒙受影響。」此外，魯斯克更在答覆所詢如何應付共匪之核子威脅時，堅決地強調將不惜使用任何武器。這種重申美國核子傘保障功效的聲明，多少已沖淡了日美間在對匪問題上的歧見。

四 東京之魯斯克佐藤會談

美國務卿魯斯克與日首相佐藤的一次個別會談，係於七月七日下午在東京舉行。早在七月初當魯斯克尚未啓程赴日前，美駐日大使雷紹華即會特與佐藤首相預先商談過所要會談的諸項問題為：（一）所謂「中國問題」；（二）越戰

問題：③東南亞問題；④日美兩國基本關係。這是對日美京都會議遺留下來未獲解決諸項歧見的最後協調；也是繼去年初美總統嬉森與日首相佐藤華府會談後的另一次日美高階層會談。

魯斯克、佐藤會議的內容，事後並未見有所公佈。關於日美對共匪譴責的差異問題，究竟談出怎樣的一個結果來，也還是一個謎。日本政府的官房長官橋本曾稱：「現尚不能言明」一語，則更增多了一中的微妙成份。據日本報紙所零星透露資料，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兩點推測：

階層可能睜開眼睛看清國際情勢與世界潮流，以免其將來益陷孤立化。接着佐藤便引伸到日本所具有優於美國的對匪接觸條件，意圖迎合美國所唱對匪「架橋」的構想而負起藉貿易代替美國從中架橋的任務。

二、魯斯克認爲共匪無改變其當前政策之可能。趙願之難以取得和平解決，即因共匪挾持北越以遂行其好戰政策而造成。魯斯克本此觀點，便乘機指摘日本政府對共匪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說明任何柔軟政策都無法使共匪變質，至於美國的對匪「架橋」構想，係假定在完成前提——即共匪自動反省後施用，不能作斷章取義的解釋。

佐藤在與魯斯克會談中，自己確實體會到美國的固定不移的對匪政策。日本政府可能是鑒於半年來美國內的對匪姑息言論橫行，誤認為可以藉勢推動美國政府的對匪政策，為其擴大對匪貿易打出一條通路來的。但魯斯克所表現的堅決態度，則是頗令日本朝野有意外之感。在此種情形下，日本是與美對匪政策背道而行呢？還是追從美對匪政策呢？這是需要一段「觀察時間」的。所以佐藤與魯斯克的會談內容不便公佈的理由在此。還有必然涉及的日本自身對防衛問題；以及日美安保條約未來趨向，也都在不便公佈的保密之列。其見於公佈者，則有下述二端：

一、日本會於多年來一再要求歸還琉球，撤除琉、日間之諸種人爲限制，魯斯克對佐藤所提起之有關琉球裁判權問題，表示正作檢討，信其必可圓滿解決。

五 日美合作關係展望

日美之基本關係，係建立在安保條約所課協同合作的體制之上。日本外相椎名已國在國會數次答覆在野黨質詢中對此予以釋明，如謂：「日本為遵守安保條約，對美國負有援助其行動之義務而具特殊關係」；「日美安保條約為軍事條約」。這一點首先註定了在條約有效期間，日美的關係不會發生劇大變化。

日美在對共匪問題上的歧見，雖一時不易達成協調，但共匪對日本政府的苛峻態度，亦使日本不敢過分幻想貿易利益而輕於疏美就匪，這是使日本尚能保持冷靜抉擇的一個要因。日本在觀察期間，只能以不超越美方所反對的長期信用付款之限度內，維持當前的對匪貿易現狀，乃是可想像的。

魯斯克此次在日會數度列舉日本一年來在國際社會的重大成就為召開東南亞經濟開發會議；贊助創設亞洲開發銀行，參加漢城九國會議等範例予以讚揚，並稱「今後日美兩國應對援助亞洲多多交換意見，強化合作體制」，這都意味着美方期待日本與其合作的致力方向。

基於上述，可以預計的今後日美關係似將着重於下列之推進事項：

- 一、美將促請日本以經濟力配合美國在亞洲之軍事部署，美為培養日本在亞洲領導地位，將支持由日人渡邊武（原世界銀行理事）出任亞洲開發銀行總裁，並以該銀行為實施日本主張以發展亞洲農業為主計劃之後盾。同時，亦向日本所倡設立之農業開發基金出資，贊同日本於今年內召開東南亞農業會議。

二、靈活運用日本所能遏止共匪週圍諸中立國倒向共匪之號召力，由日本居中擔任美國與難以接近諸國如緬甸、柬埔寨、印尼間之聯繫，以收間接有助於美對共匪圍堵政策之某種效果。美國認為凡能為日本填補其對亞洲政策之缺陷，即為一大收穫。

不過，問題是美國對日本實力的評價是不是太高？日本的國際政治感覺也常犯有遲鈍與冥頑之嫌。還有本文在前面所指出的：日美雙方應有的「誠」「信」基礎，尚未臻於鞏固，因而可預料這合作關係仍將有一段崎嶇路程。

六 結 語

日美會談中在對共匪問題上以日方堅持己見之故，顯出了日美不協調的破綻。

共匪會於六月廿一日以為外交部名義發表了一篇攻擊日本政府的聲明，謂「佐藤政府制定了進攻『中國』的朝鮮的『三矢計劃』；舉行了『東南亞經濟開發會議』……在漢城會議中起了主要幫兇作用。一貫支持美侵略越南戰爭，把日本變成美帝的軍事基地和後勤基地。」又稱：「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帝扶植下正在死灰復燃，充當美帝陰謀在亞洲擴大侵略戰爭的突擊隊」。對這類惡毒的誣蔑語句，日本國內的左翼勢力也在同聲呼應，如社會黨謂「日美此次會談是在求加強侵略越南戰爭與圍堵中共」，共產黨則謂「日美推進侵略戰爭新階段」，「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都毫不隱晦地暴露它們甘願充當共匪的第五縱隊角色，一遇有機會必須要表演一番親共匪、反政府、反美的台詞動作。

日本政府對此所採取的方針，一向是聽其睡面自乾，並搶先結交共匪以期減低左翼勢力挾匪自重的脅迫。這種做法也許行之有效，但忽略了它為自身帶來危險後果的副作用。日本強調「貿易立國」，要增進對世界各地貿易關係以擴大市場，固亦不容非議，可是如果不能輔之以政治理想，單是唯利是圖，那就終不能免受視日本為「經濟動物」之譏的。日本識者之為日美關係抱有隱憂，亦即在此。

中共的土地鬥爭

黎明華著

在落後國家，共黨奪取政權之形式，係進行長期武裝叛亂，以

農民為主力軍，先據農村，後奪城市。而其裏脅農民之主要手段，即係土地鬥爭。本書即以此為着眼點，研究中共之土地鬥爭，從而探索共匪此一路線對落後國家之威脅，如今之越共然，並明示台灣所進行之土地改革，可謂具有精闢見解之精心作品，全書共六章二十萬言。

平裝定價四十元，精裝五十元。均特價七折。在學學生及軍人按定價五折優待。